

---

# 近代丝绸生产发展与江南社会变迁

王翔

---

古往今来，丝绸生产一直与江南地区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19世纪中叶以后，江南丝绸行业率先开始了由传统手工业向近代机器工业的蜕变，在促进经济发展、文化转型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为江南社会的变迁注入了源源的活力。在这些变化中，有些是局部的，有些则比较普遍，有些是隐蔽的，有些则相当明显，有些是昙花一现的，有些则影响深远，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会使人们触摸到江南社会变迁的脉搏。本文旨在揭示近代丝绸生产发展所造成的江南社会的种种变化，不言而喻，是将其作为众多历史合力中的一支分力来加以考察的，并没有丝毫无视或看轻其他因素作用的意思。为了衬托基本内容的清晰，不得不容忍某些枝节的淡化，正如绘画理论中的“远山无皱，远水无波，远树无枝”。

## 一、固有经济结构的改组

蜂拥东来的西方商人，并没有忘记花团锦簇的中国丝绸那无可比拟的市场价值，他们一面携来大量棉纱棉布，攘夺中国土布的市场；一面却又尽力搜求和扩大中国丝绸的出口。一时间，生丝出口量骤增，丝价高腾，尤其在欧洲蚕体微粒子病猖獗的60—70年代，以七里丝（湖丝）为主的江浙土丝更得以非常之价输往欧洲市场。于是，造成了植桑与种粮之间悬殊的收益差距，

“一亩粮田，若种成密桑，其利乃五倍于谷麦”<sup>①</sup>。同治12年，无锡地主华翼纶写信给他女婿，说他去年买田15亩，种桑3千株，估计每株桑树可采叶20斤，每百斤桑叶时价1元4角，当时米价不过每担2—3元，植桑利润比种稻至少高出4—5倍<sup>②</sup>。

“大利所在，万众所趋”，民间原有的生产结构和营生习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和改变。有人描述说：“江浙两省本驻织造局，专制上用物料，或有贵重精良之品，而居民不以为过问，故蚕业终不大兴。发匪平后，各国通商，民俗奢侈，于是浙之嘉、湖，踵事增华，桑者大盛。农夫废禾，不耕而食，比户千金。杭、宁织户既争妍斗靡，贩者云集，而泰西各国亦来购取，岁入累千万，邻近艳羨，争相仿效”<sup>③</sup>。人们对丝绸生产由“淡漠”到“艳羨”，由“不以为过问”到“争相仿效”，反映了商品经济意识日渐深入人心的社会现实，反过来又成为发展丝绸生产的强效激素。许多农家“废禾而桑”，“以丝为田”，把过好日子的希望寄托在植桑、育蚕、缫丝、织绸上，出现了“户户栽桑，家家育蚕，不问男女，皆从此业”<sup>④</sup>的繁盛景象。浙江嘉兴、湖州地区的13个县，桑田面积平均占耕地总面积的26%，海宁县竟占到51%，桐乡县亦占49%<sup>⑤</sup>。江苏无锡一县，“桑田九百五十余方里，约占全面积十分之三有余”<sup>⑥</sup>。个中奥妙，无非因为“每届生丝出后，顷刻高价出售，农民转觉生计裕如”；有时甚至“将湖丝销售洋庄，一转手间，巨富可以立致”<sup>⑦</sup>。确实有不少人因此而发财致富，《南浔志》记载：“该地因产丝甚多，经商上海日众。与洋商交易，通言语者，谓之通事；在洋行服务者，

① 《江苏无锡农民状况调查》，《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

② 参见《近代无锡蚕业资料选辑》。

③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482页。

④ 《申报》光绪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⑤ 参见《浙江省丝绸史资料》。

⑥ 卢冠英，《江苏无锡县二十年来之丝业观》，《农商公报》第85期，1921年。

⑦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82页。

谓之买办。镇人业此而起家者不少”。曾有“二狮、四象、八牯牛、七十二狗”的称喻，据说拥资30万以上者称狗，50万以上者称牛，100万以上者称象，1000万以上者方有资格称狮。蚕桑业的兴盛，商品性农业生产的扩展，瓦解着几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小农自然经济在世界市场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趋于解体。

在废禾植桑之风大炽的同时，传统缫丝业则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鸦片战争以前，在丝绸行业的蚕桑、缫丝、织绸三道主要工序中，只有江南一些城市的丝织业萌生了新生产关系的幼芽，蚕桑业与缫丝业却一直牢固地结合于小农经济的内部，从未出现过养蚕与缫丝相分离的情况，“蚕户各自以收获之成茧，直于自家缫丝，而以生丝出售，向无缫丝与养蚕相离分之观念”<sup>①</sup>。鸦片战后，江南蚕丝业开始根据欧美市场的需求，改组传统的生产结构，引进新式缫丝机械，出现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机器大生产。早在1891年，在上海出现了中国境内第一家外国丝厂——怡和纺丝局，开始了机器缫丝的尝试。其后，英、美、法、德等外商丝厂陆续开办，它们所使用的先进机器设备、所采取的先进管理方法和所获得的超额利润，都令长期来埋头于土法缫丝的国人眼界大开，观念大变。1880年，浙江湖州人黄佐卿购买意大利直缫丝车100台，于上海苏州北路开设了公和永丝厂，成为江南地区第一家民间商人开办的机器缫丝厂。流风所及，上海、江苏、浙江各地纷纷“照西人方法招集股份，设立机械缫丝厂”，这些新式丝厂“生意颇为热闹，咸往各乡收买蚕茧”<sup>②</sup>，以此为开端，中国的蚕桑业与缫丝业日渐分离，农村中的蚕农开始由过去的蚕农=土丝缫制者向蚕农=鲜茧出卖者转化。迄民国初年，江

① [日] 铃木智夫，《清末无锡地区蚕桑业的发展》，1987年5月，武汉，“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② 参见《近代无锡蚕桑业资料选辑》。

南蚕区农民已经基本上“皆售茧而不缫”<sup>①</sup>。浙江平湖，“育蚕户都将鲜茧出售，并不自己缫丝。因为这种形势由来已久，现在育蚕户的缫丝器具已经没有，缫丝技能也已消失了”<sup>②</sup>；江苏无锡，“每至收茧之时，人民担茧至行中求售者，势如潮涌，欲再觅旧式车缫丝者，不可复得矣”<sup>③</sup>。这是我国丝绸发展史上的一大变局。传统的自植桑、自养蚕、自缫丝、自织绸的自然经济格局被拦腰截断，它对转换小农的劳动习惯，扩展小农的狭隘视野，改变小农的固有心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相形之下，传统丝织业的变化也许更为引人注目。中国的丝织工艺水平曾经长期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正当它在传统轨道上颠蹶徘徊的时候，几乎一夜之间，高下优劣之势就发生了根本的逆转。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首先在纺织工业领域引起根本性的变革，丝绸工业迅速崛起，发生了在工具上由手拉机到电力机，在原料上由天然丝到人造丝的飞跃，因循守旧的中国传统丝织业，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于是，江浙两省之绸商，为挽回利权计，不得不随时势而改良，纷纷购置铁机，采用电力，研究合时花色，以供社会之需求”<sup>④</sup>，在丝织领域内展开了一场规模虽不算大意义却不容低估的“产业革命”。

传统丝织业的第一个进步，是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沿袭使用了数百年的旧式木织机开始退出丝织生产领域，相继引进了国外的手拉提花丝织机和电力丝织机，完全的手工操作逐渐演变为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较诸手织，出货既速而工价又廉”<sup>⑤</sup>，大大提高了中国丝织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使用旧式木机，1台2人合作，日出缎绸6尺；改用新式拉机，1人1台，日出2丈；采用电

① 孙伯和：《民元来我国之蚕丝业》，《银行周报三十周年纪念刊》。

② 吴晓晨：《浙江平湖的蚕桑业》，《新中华杂志》2卷15期，1934年。

③ 卢冠中：《江苏无锡县二十年来之丝业观》，《农商公报》第85期。

④ 苏州档案馆藏：《云锦公所、铁机丝织同业公会请议服式案》。

⑤ 苏州档案馆藏：《振亚织物公司拟将手织机全数停歇，呈请县府允准解雇部分工人案》。

力机后，1人1机，日出4丈。

传统丝织业的第二个进步，是丝绸原料的新陈代谢。原先的丝织原料完全是蚕区农民家庭手工缫制的土丝，随着新式缫丝工厂的广泛设立，农家土丝来源日渐枯竭，而新式织机的推广应用，又对丝织原料提出了新的要求，丝织业开始舍弃沿用了数千年的土丝，寻找新的适用原料。首先选择了机器缫制的厂丝，其后又接受了人造丝，“人造丝光亮价廉，制成绸货既可减轻成本，利于销售；复以质属植物性之故，与天然丝之动物性迥异，用以交织，尤可藉化学之力，随意染成双色，故目下人造丝之需要逐渐增多，几与天然丝相埒”<sup>①</sup>。人造丝的采用，突破了传统丝绸品种的固有格局，创制了天然丝与人造丝的交织物，兼有蚕丝的强韧与弹力和人造丝的色泽与光洁，质既柔软，色亦鲜艳，而且降低了生产成本。

传统丝织业的第三个进步，是经营方式的推陈出新。千百年来，中国丝织业的主体，一直是乡村农民的家庭副业生产和城镇手工业者的小商品生产，明末清初虽有商业资本发放原料给机工代织的“包买商”行庄制经营出现，但仍只是一种分散的家庭劳动。民国以后，情形为之一变。分散的家庭劳动逐渐向集中的工厂生产过渡，各地过去放料收绸的丝织业“帐房”纷纷不再放料而“购机建厂”<sup>②</sup>，一些机坊和机户也合资集股，联合办厂，新式绸厂不断在各地涌现，“象雨后春笋一般地发达起来”<sup>③</sup>。据不完全统计，到1926年底，新式丝织工厂上海有近200家，苏州有59家，杭州有100余家，湖州有60余家，宁波有4家，连小镇盛泽也有10余家。江南地区丝织业由传统的分散家庭劳动向新型的集中工厂生产的转化，表明中国丝织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完成了由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过渡，这是传统

① 苏州档案馆藏：《丝织业所需原料希望政府保护并开发之意见书》。

② 苏州档案馆藏：《民国九年铁机丝织业公会呈请立案》。

③ 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32页。

丝绸业走向近代化的显著标志之一。

随着传统丝绸业向近代机器大生产的推移过渡，江南丝绸生产的传统格局和固有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代机器生产已经动摇了传统手工操作的固有地位，在一些都市和城镇中，甚至已经成为丝绸生产的主导方式。毋庸置疑，江南地区的传统丝绸业至此已经跨入了近代工业的门槛，其标志就是一代新质生产力正以一种新型的产业组织为载体，出现于社会生产力的大系统中。这种新质生产力，不仅在构成因素、组合方式、总体功能上同作为母体的旧质生产力相比表现出更新的内容，而且势必成为促使江南经济结构改组和社会生活演变的强大力量。

## 二、新兴社会群体的崛起

近代丝绸生产的发展，促成了一些新的社会群体的崛起。他们以雄厚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对个人权益的执着追求，对公共事务的广泛兴趣，以及对政治活动的热心参与，都集中反映了江南社会在政治层面上的种种变迁。官府威权削弱，传统控制松动，而丝绸业资本家群体则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在江南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第一，这个社会群体，已经具有了比较主动的参与热情。随着经济力量的不断膨胀，江南丝绸业资本家的政治热情也在不断高涨，越来越企求在政治上表达自己的呼声，提出自己的要求，实行自己的主张。清朝末年，江南各地城镇相继成立商会，“为综握商务之机关，凡我商民均隶属之”<sup>①</sup>，丝绸业资本家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在呼吁实行宪政，推行地方自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苏州是全国最先一批成立商务总会的城市，这里的商务总会就是由“缎商、钱市暨各业领袖发起组织”<sup>②</sup>的，第一届议董共

① 苏州档案馆藏：《观前大街市民公社第一届报告册》弁言。

② 苏州档案馆藏：《苏州商务总会年事纪要》。

计16名，其中丝绸业资本家就有3名<sup>①</sup>。从1905年到1911年，先后有6名丝绸业资本家担任过苏州商务总会的议董，好几人都是连任数届<sup>②</sup>。1910年6月，在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中，上海和苏州两个总商会的领衔代表就是著名的杭恒富禄记绸缎庄老板杭祖良，他会同全国其他10个团体的代表，向都察院呈递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成为晚清宪政运动中的风云人物。稍后，江苏商民掀起声势浩大的“裁厘认捐”斗争，杭祖良又被推举为“筹办江苏全省认捐事务所”的总干事长，在政治上崭露头角。辛亥革命前后，苏州和其他一些丝绸生产发达的城镇出现了“市民公社”的地方自治机构，“因尽出自商民，故曰市民公社”<sup>③</sup>。

“市民公社”热心于当地的学务、卫生、治安、道路工程、农工商务、慈善事业、公共营业等自治事宜，对金融、税务、物价、军需、杂捐等也施加极大的影响，不断地蚕食着封建官府的各项权威，扩展着资产阶级的自治体制，“振兴市面，扩张权利，不惟增无量之幸福，更且助宪政之推行”<sup>④</sup>。江南商民们把“市民公社”视为“独立社会之起点”<sup>⑤</sup>，不禁使人们连想起法国市民在争取地方自治和第三等级政治权利的斗争中，就曾把自己的新兴城市称作“公社”，历史真是常常有惊人的巧合。民国以后，江南丝绸业资本家的政治热情有增无减。1915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于北京集会，沪苏商会代表都是著名的丝绸界人士。上海代表是上海总商会副会长、老九福绸缎庄老板王文典，苏州代表是总商会议董、王义丰纱缎庄老板王介安。他们连袂赴京，联名向大会提交了《加税裁厘意见书》，把斗争口号从清末的“裁厘认捐”发展为“裁厘加税”<sup>⑥</sup>。它改变了清末那种自甘画地为牢

① 据苏州档案馆藏：《苏州商务总会第一届选举职员姓名录》。

② 据苏州档案馆藏：《苏州商务总会年事纪要》。

③ 苏州档案馆藏：《渡僧桥四隅市民公社第一届报告册·办社缘起》。

④⑤ 苏州档案馆藏：《观前大街市民公社第一届报告册》弁言。

⑥ 苏州档案馆藏：王介安、王文典：《裁厘加税意见书》。

的做法，既要裁撤厘关税卡，废除封建性的厘金制度，又要增加海关税率，反对殖民地性的协定关税制度，已经具有从根本上取消协定关税制度，并进而否定整个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明确意向，“亟宜乘此时机请愿政府与各国，要求有国定税则之权，使国际税法得趋于平等，还我关税自由之独立主权”<sup>①</sup>，进而“根本修正各种不平等条约，俾还我国家自由独立之主权”<sup>②</sup>。如果说，清末“裁厘认捐”还主要是一个单纯反封建的口号，只是曲折地表现出反对外国侵略意图的话，那么，民初“裁厘加税”就已经具有了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性质。从“裁厘认捐”到“裁厘加税”的发展，不仅表明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觉悟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也透露出江南资本家群体内部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一个信息，反映出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已经有所增长，阶级意识正在不断强化，因为显而易见，“裁厘认捐”活动主要适应着商业资产阶级的需要，而“裁厘加税”斗争则更多地代表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与在此期间中国传统丝绸业中进行的“产业革命”，并非毫无关系。

第二，这个社会群体，已经具有了比较迫切的革新愿望。面对着传统丝绸业四伏的危机和环生的险象，江南丝绸业中的有识之士一面致力于劝用国货，抵制外货，一面清醒地认识到：“大凡人之用物，必求其价廉而质美，非强权威力所得而挽也，非令名美誉所得而诱也”，“非亟谋改良，不足以利销行而维实业”<sup>③</sup>。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传统的生产手段和经营方式过于落后，痛切地认识到“木机土法丝绸之不足恃”<sup>④</sup>，从而开始“亟思补救之法”：“（一）改良货品；（二）减轻价值；（三）提倡同胞，使人人有爱国热忱，共用国货。凡此三者，似皆当务之

① 苏州档案馆藏：王介安、王文典：《裁厘加税意见书》。

② 上海档案馆藏：《中华国货维持会致各公团书》。

③ 苏州档案馆藏：娄凤韶：《策进振亚公司商榷书》。

④ 苏州档案馆藏：《民国九年铁机丝织业同业公会呈请立案》。

急，际此商战时代，民国方兴，不早改图振兴，将何以自立于优胜不败之地”<sup>①</sup>？江南丝绸业者“鉴于舶来之输入日盛，国货之制出日衰”，不是习故蹈常，抱残守缺，而是面对现实，锐意革新：大量引进新式工具，变木机为拉机、电力机；大胆采用新型原料，变土丝为厂丝、人造丝；大力改善经营管理，变分散织造为集中生产。这样，江南丝绸业就在清末民初形成了一个“建厂购机”的热潮，“进行之神速，出品之精良，实有一日千里之势”<sup>②</sup>。

当然，江南丝绸业资本家如此亟亟乎传统丝绸业的改造和更新，固然基于其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但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种逐利欲望可以与爱国热忱并行不悖。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江南丝绸业资本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自己的生存发展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说：“丝绸业存亡兴衰，不独关系我华财政，即国计民生，亦大有妨碍，若不设法亟早补救，挽回利权，中华前途，何堪设想！”<sup>③</sup>为此，他们愿意承担一定的牺牲，呼吁“商界同仁，各尽义务，以挽回大局，但求保全血本，不计图谋余利”，“以折本轻价廉，销路畅旺，得与外洋各货并驱争胜，庶中华商务得以发达，经济亦遂裕如”<sup>④</sup>。其中，显然蕴涵着江南丝绸业资本家群体的由衷之情和肺腑之言。

第三，这个社会群体，已经具有了比较强烈的团体意识。“欲期旧商业之进行，急须合群自固”<sup>⑤</sup>，这可以说是近代江南丝绸业厂商社会活动的一根轴心，他们在积极参与国内各种社会组织活动的同时，也开始建立起自己的行业团体。1912年初，民国初创，江南丝绸同业联合发起组织了中华国货维持会，“以保全

①③ 上海档案馆藏：《中华国货维持会意见书》。

② 苏州档案馆藏：《民国九年铁机丝织业同业公会呈请立案》。

④ 上海档案馆藏：《中华国货维持会致各公团书》。

⑤ 苏州档案馆藏：《云锦公所为组织支部维持国货呈请备案》。

商业，疏通已成之货，并研究新出品，讲求发达，藉杜漏卮为宗旨”<sup>①</sup>。在《中华国货维持会发起人、议董题名录》上，钱江会馆代表（杭州丝绸业）、云锦公所代表（苏州丝绸业）、金陵缎业代表（南京丝绸业）、绉业代表（湖州丝绸业）、盛泾公所代表（盛泽和嘉兴丝绸业）等赫然排在前列<sup>②</sup>。中华国货维持会还在一些丝绸业发达的城镇建立支部，如苏州“爰就本城云锦公所组织中华国货维持会，专以改良苏产丝织各品，维持中华国货产品为宗旨，成立之日，报告于上海国货维持会总事务所，并认为苏州支部”<sup>③</sup>。各种情况表明，中华国货维持会实际上是江南丝绸同业的团体，至少也是一个以丝绸业为主体的组织。它在民国元年成功地发起和领导了“服用国货”的斗争，向江、浙、沪三地都督和民国政府参议院一再请愿，反复陈辞，“幸得通过剪发而不易服，而江浙人民生计赖以复苏”<sup>④</sup>。1918年12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华国货维持会又牵头在上海召开各团体联合会，“讨论我国国民对于巴黎和会应取何种立场，各团体代表到者数百人，全体一致赞成集合一各团体之联合总机关，以达国无大小强弱，各事一例平等待遇，俾达全世界永久和平为目的”<sup>⑤</sup>，居然开始突破了单纯经济斗争的狭隘藩篱。

1916年，“江浙丝织联合会”又告成立。该会宗旨在于：“江浙两省，夙以丝绸名天下，联合会之设，所以联络意见，改良制造，推广丝绸国货，挽回利权”<sup>⑥</sup>。联合会创设之后，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五载以来，两省丝织品日新月异，实为该联合会竞相提倡，实行改良制造之成绩。现在会务日见发达，组织

① 上海档案馆藏：《中华国货维持会缘起》。

② 见上海档案馆藏：《中华国货维持会章程文牍汇纂》。

③ 苏州档案馆藏：《云锦公所为组织支部维持国货呈请备案》。

④ 苏州档案馆藏：《云锦公所各要总目补记》。

⑤ 苏州档案馆藏：《苏州代表王介安报告会议情况》。

⑥ 浙江图书馆藏：《调查江浙丝织业团体》。

益形完备”<sup>①</sup>。

一般说来，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着严重的妥协性和依附性，其独立自主能力是较差的，因此，团体意识的加强和组织程度的提高，不失为衡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成熟程度的标尺之一。民国初年，江南丝绸业资本家的团体意识和组织能力空前增强，已经认识到“期求一业之发达，不有团体以联络之不足以奏功”<sup>②</sup>，先发起组织中华国货维持会，又倡导成立江浙丝织联合会，这是江南丝绸业资本家突破地域界限，实现在更大范围内、更高程度上进一步联合的努力；其目的从唤起商民，改良生产，抵制列强经济侵略，发展到要求“免除各业所受外交条约上不平等之种种痛苦”，“以达国无大小强弱，各事一例平等待遇”<sup>③</sup>，显示出江南丝绸业资本家群体经过行业改造与更新后的崭新风貌。

第四，这个社会群体，已经具有了比较明确的领袖意志。过去，丝绸手工作坊主和商人常常依附于封建官府的卵翼之下，唯唯诺诺，噤若寒蝉，尽管对封建官府的压榨和盘剥心怀不满，但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近代以后，江南丝绸业资本家的斗争精神和领袖意志有所加强，公然声明，凡是触犯自己阶级利益的官府政策，“全体决誓尽力抵抗，不得承认”<sup>④</sup>！1920年，军阀政府策划新增所得税，“反对声浪，遍于全国，不独苏商怨怒之深”。上海商董发表《审查所得税报告书》：“一谓未经国会通过，无奉行之必要；二谓保民之政策未行，徒以民脂民膏供彼武人自相残杀之用，更无奉行之义务；三谓历年教育费仅占岁入之十一，而常年军费岁达七、八亿，去年学潮发生，竟驱军警蹂躏学生，如此摧残之不暇，恐所得税适以增内哄之战斗力，外债之抵押品

① 浙江图书馆藏：《调查江浙丝织业团体》。

② 苏州档案馆藏：《铁机丝织业同业公会呈请立案》。

③ 苏州档案馆藏：《苏州代表王介安汇报会议情况》。

④ 苏州档案馆藏：《云锦公所致总商会函》。

而已。”<sup>①</sup>苏州商民闻讯表示：“以上种种指摘之点，吾民均极赞同，皆心所深恶而口所欲言者也者。上海商董既已揭而出之，惟有望风鼓掌，同声抗拒”<sup>②</sup>！他们正告军阀政府，“犬马寇讎，本为对付，铤而走险，急何能择！用敢下一决绝语曰：无论刀锯在前，釜镬在后，所得税誓死不认”<sup>③</sup>！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在这一时期，江南丝绸业资本家也象历史上那些雄才大略的帝王将相们一样，津津乐道起水与舟的关系来了：“在主其事者（指军阀政府），必曰彼蚩蚩者，力甚懦也，气甚散也，可以为所欲为。不知水至懦也，有激之者，可以覆巨舟；沙至散也，有骤之者，可以障横流”<sup>④</sup>。对人民群众伟大作用的认识，正是为了实现和加强他们的领袖地位。他们认为自己是当然的行业领袖，只要他们“登高一呼”，就会立即“群山响应，于最短时间收事半功倍之效”<sup>⑤</sup>。例如，他们曾利用各种时机、各种场合、各种方法宣传服用国货，“唤起爱国同胞之购用绸缎”，传单的字里行间，充分流露出丝绸业资本家自认是当然群众领袖的优越感和自以为肩负历史使命的责任感：“公民等托身商界，蒿目时艰，窃念立国元素，致富在商；富国原理，改良在货”<sup>⑥</sup>。至于丝绸行业的改造和更新，他们更是当仁不让地认为：“改良织造，其被动在工，而主动在商”<sup>⑦</sup>。这些“救国救民，舍我其谁”的言论和气概，很难说仅仅是一种不自量力的狂妄与空想，在其背后，明显可见江南丝绸业的迅速改造与更新，所给予丝绸业资本家群体的几分乐观与自信，也透露出一些民国以后传统的

① 上海档案馆藏：《江苏省商会联合会议案稿》。

② 江苏省档案局：《民国九年苏州总商会提交省商会联合会议案》。

③ 苏州档案馆藏：《所得税案审查报告》。

④ 上海档案馆藏：《江苏省商会联合会议案稿》。

⑤ 上海档案馆藏：《中华国货维持会公函》宣字第2号。

⑥ 苏州档案馆藏：娄凤韶：《对于国货维持会宣告个人之意见》。

⑦ 苏州档案馆藏：《纱缎庄李宏兴拟备款购址组织铁机工厂案》。

士、农、工、商社会等级序列被完全打乱，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遭根本改变的社会进步的信息。

### 三、传统社会生活的演变

近代江南丝绸生产的发展和丝绸业资本家群体的形成，不仅造就了政治自由度的增加，而且促成了社会自由度的扩大，在政治权威弱化、压抑放松的同时，社会权威与习惯势力也在不断式微，从而为社会的变迁和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日益广大的空间，给近代江南社会增添了引人注目的新气象。

中国传统的丝绸工商，只要凭师承的技能和直观的经验，就可以“工作得利，生计舒服”，因而大多“不读书，不识字”<sup>①</sup>。丝绸商人“是号称先生的，一般都目为上层社会，但是西瓜大的字能识得一担和能够看清楚戏目的，恐怕不到十分之七、八。他们且如此，无怪耕田的农民，织绸的劳工，只知道纸上的黑字，一字勿识，认作门闩呢！”<sup>②</sup> 丝绸生产的近代化，直接带来了对丝绸业者的新要求和新标准。旧式丝绸小生产者愚昧无知、孤陋寡闻的缺陷越发明显，渐渐无法适应近代化丝绸生产的需要，这就促使丝绸业者“想到工业和教育，是应该联合求进步的”<sup>③</sup>，开始认真地思考兴办丝绸教育的问题：“应怎样提倡设立工读学校给工人辅助知识呢？应该怎样赶快开办织工学校，以造就有知识的新工人呢？”<sup>④</sup> 从而提出了“推进平民教育，实行工读主义”的主张。一时间，兴办蚕桑丝绸教育蔚然成风，既有正规化的蚕丝专科学校和蚕桑系科，也有职业教育型的“育蚕指导所”和“织工补习班”，还有“最简易极普遍”的通俗教育事业，包括宣传演讲、阅书报社、露天报牌、通俗音乐、流通图书、揭示

① 参见《盛泽志·教育编》（未刊本）。

② 《提倡平民教育》，《新盛泽》民国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③ 《发展盛泽绸业的动机》，《新盛泽》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④ 吴江县档案馆藏，案卷号：8—10；全宗号：5079—30。

格言、劝导传单等等。在许多丝厂和绸厂的章程中，都规定工人每日下工后必须参加一小时的夜校学习；以“增长见闻，研习技术，提高技能”<sup>①</sup>。1910年，杭州创办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内设机织和机械染色等科，并附设艺徒班。1912年，浙江绸业会馆拨款1.5万元，委托中等工业学堂主办机织传习所，以培训各厂采用日本仿制的丝绸提花机的技术力量，先后在杭、嘉、湖、宁、绍地区招收培训了2000多名丝织工人<sup>②</sup>。丝绸教育的兴办，其结果不仅是为江南蚕桑丝绸业的发展提供了符合条件的劳动人手，而且包含着“改良社会”的效能，正如江南丝绸业人士所说：“要考察社会程度的高下，只要看那社会的政治和那社会的教育，便可分晓，社会的政治如果修明的、社会的教育如果普遍的，那个社会便是进步的社会。”<sup>③</sup>可见兴办丝绸教育原是被作为改造社会的一个手段的。

在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和“男耕女织”为主要生产形式的传统社会里，妇女所擅长的纺织技能使其更多地得益于近代丝绸业的发展。近代丝织厂招收的工人“约男女各参其半”<sup>④</sup>，缫丝厂中女工更占绝大多数。近代工厂的组织形式和操作系统具体体现了工业社会的一系列原则，蕴含着改造人、重塑人的巨大能量，来自传统农业社会生活背景的女性进入工厂后，必然要对这些原则作出反应，在改变了的时空环境中，逐渐地学会适应并参与工厂的活动，自动地接受近代社会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渐由传统女性转变成近代女性。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和思想意识的开放，使得“妇女解放”的声浪日益高涨，人们从丝绸业女工的身上看到了传统女性身受束缚的根源

- 
- ① 参见苏州档案馆藏：《民国九年苏州铁机丝织业同业公会章程》，《苏州铁机丝织厂甲种艺徒章程》等。
- ② 参见《浙江丝绸史资料》。
- ③ 《今后盛泽市民应有的觉悟》，《新盛泽》民国十六年七月十六日。
- ④ 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31页。

在于“没有生活能力”，“为改良家庭生活，提倡女子自立，应该提倡妇女职业，与以专门技术”<sup>①</sup>。于是，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一些生产性和文化性的妇女团体，女子参加“妇女补习学校”成为时髦，文化的提高和就业的增加，带来了妇女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转换，对传统家庭关系和婚姻制度的演变推波助澜。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关系和婚姻制度，适应着自然经济生产活动的需要，具有着连续性（以保持血缘纯正）和超稳定性（不可离异）的特点，这种家庭结构的稳定，是在强大的道德伦理压力下，通过对爱情的剥夺来维持的。在工业社会中，家庭的经济功能渐由生产转向消费，女性的就业和自立，使家庭关系不再取决于经济因素和血缘因素，而开始取决于婚姻生活的实质内容，去追求以爱情为基础的夫妻结合。他们把“男女婚嫁主权，悉操父母之手，或为势力压迫，或为礼壁束缚”的旧制度斥为“非人道的婚姻制”<sup>②</sup>，“理论上不免滑稽，事实上尤多苦痛”<sup>③</sup>，主张以离婚作为那些日日勃谿、已成怨偶的夫妻的出路，“自由恋爱”和“离婚再嫁”成为日渐普遍的口号和社会现实。尽管卫道士们哀叹人心不古和世风日下，但它正反映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开始有了较多的宽容与人道。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妇女的社会地位，正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一根尺度。

近代化机器动力的采用，工厂制集中生产的建立，大大增加了劳动强度，也使丝绸业的劳动日益社会化，劳动的社会化同样要求生活时间的社会化。随着大量丝绸小生产者从农村移民到都市和城镇，经受了都市文化的洗礼，“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传统作息习惯不再为人们所信守，“十小时工作制”、“八小时

① 《求益湘绣社成立》，《新盛泽》民国十二年九月一日。

② 《改良婚姻之研究》，《新盛泽》民国十二年十二月一日。

③ 《一封婚姻问题的信》，《新盛泽》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一日。

工作制”等逐渐在社会上推广开来，“工作八点钟，休息八点钟，睡眠八点钟”<sup>①</sup>逐渐成为社会通则。这“休息”既占了每人全部生活时间的三分之一，自然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于是在江南社会里引发了一场关于“公余”问题的论争<sup>②</sup>。在传统社会中，南北奔波的丝绸商人和终日劳顿的丝绸工匠，每逢年节假日或工作间隙，“非茶肆听书，即酒家醺饮”<sup>③</sup>，往往把赌博、吸烟、饮酒、狎妓当作“最普遍的娱乐品”。如今，丝绸业者不再甘心浑浑噩噩地生活，他们感到以往的闲暇生活“很容易由消遣而放荡”<sup>④</sup>，开始认真地考虑起应采取何种闲暇生活方式的问题。一派入矫枉过正，主张“绝端利用，毫不参些消遣意味，觉到学识浅缺的，就可读书研究；觉到有欠健康的，就可从事运动；觉到生活太干燥而苦闷的，就可学习文学、绘画、音乐等，以求精神上的高尚安慰”<sup>⑤</sup>。另一派人则认为，丝绸行业“工作多偏于机械，案牍劳神，胼胝苦身”，因而闲暇时间须有“绝端的消遣而不加限制”<sup>⑥</sup>。还有一种意见则觉得消遣与利用应当相辅相成，“不当问公余该否消遣，但问怎样消遣，才为正常……到剧院游乐场是消遣，读书看报以及学画学音乐，也哪一样不可作为消遣？正当的消遣，一方面足以回复工作的疲劳，他方面又可丰盛学识、陶冶品格于不自觉中”<sup>⑦</sup>。不难看出，近代以后，从事丝绸生产的人们开始追求一种丰富多彩、文明健康的闲暇生活方式，开始根据自己的意愿、兴趣和爱好去选择自己的活动内容，以发展自己的个性和才能，“增加做人的乐趣”<sup>⑧</sup>。在以出产丝绸著

①⑤⑥⑦ 《公余问题发端》，《新盛泽》民国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② 何谓“公余”？时人称：“公余就广义解释，是指工作以外的一切时间；但普遍专指办公后，睡眠前的几个钟头，现在我们当定一个界限，公余是包括上午晨兴后，办公前和下午办公后，睡眠前的两时间”。经过界定的“公余”时间就是社会学所谓的“闲暇时间”。

③ 《娄县续志》卷3，疆域志，风俗。

④ 《青年娱乐问题》，《新黎里》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⑤ 《设立公共体育场的根本理由》，《新盛泽》民国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称的盛泽镇上，20世纪初年出现了丝绸业者组织的各种专业性、消闲性和联谊性社团10多个，其中有“倡导昆曲革新，学习南词、教习昆曲”的“怡然社”、“己巳社”，有“研究小说，联络感情”的“小说研究会”、“渊渊学社”，有“交流知识、研究书画”的“红梨金石书画社”、“白马画社”等，成为丝绸业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公余常常光顾的场所<sup>①</sup>。这构成了近代江南社会变迁的一部分重要内容。

近代丝绸业发展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江南社会习尚的变化上。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封建礼制严密地控制着社会生活，衣饰服装具有着明尊卑、别上下的特殊功用，“缎衣貂帽，例非绅士不得僭”<sup>②</sup>。在江南大多数地区，“向来商贾不敢衣锦，中人家，妇女不饰金珠，不著罗绮”<sup>③</sup>。随着近代丝绸业的发展，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以及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浸润，以往人们奉行唯谨的衣着规矩受到了冲击和动摇，“同、光间，衣服渐渐逾格”<sup>④</sup>，“无论士庶舆台，俱力所能为，衣服宴饮，越次犯分不为怪”，连“商贾、胥隶之家，亦无不越分伤财”<sup>⑤</sup>。一方面，是许多体现封建礼制的衣冠服饰被弃如敝屣。“辛酉（1861）兵燹后，礼趋于简，习渐侈靡，非复昔比矣。昔时谒见尊长必衣冠，今则竞尚便服，甚而贺吉吊凶，亦有不具衣冠者”<sup>⑥</sup>。更有人积极主张，“一个人的服式，只要求其舒服，求其适体，不论哪一种衣服均可”<sup>⑦</sup>。连规矩最严的妇女衣饰也已今非昔比，“从前的裙是长拖于地，现在却短仅及膝，竞尚短窄，玉臂双

① 参见《盛泽志·文化编》（未刊本）。

② 龚宝琦等：《重修金山县志》，卷17，志余，风俗。

③ 汪坤厚等：《娄县续志》，卷3，疆域志，风俗。

④ 储学洙纂：南汇县《二区旧五团乡志》，卷13，风俗。

⑤ 林达泉等：《崇明县志》卷4，风土志，风俗。

⑥ 姚裕廉等：金山县《重辑张堰志》，卷1，区域志，风俗。

⑦ 《我为女同胞叫屈》，《新盛泽》民国十五年三月十一日。

露，酥胸紧束，健步如男子，不尚婀娜之致”<sup>①</sup>，全无过去的弱不禁风之状。与之相适应，以往的三寸金莲便为人们所厌弃，天足受到人们的赞赏，社会上开始通行六寸圆庐，其后又“流行起高跟尖头的皮鞋来了”<sup>②</sup>。另一方面，是原来象征等级特权的绸缎服装穿着日广，渐由只有封建士大夫们方能占有变为普通民众都可享受。“一般人都存有这样的心理：‘我们出绸的地方，穿着一些绸，也是家常便饭，算不得什么’”<sup>③</sup>。此风一倡，民间衣饰“多以花缎为常服矣……虽有节衣之布告，布衣之大会，不问也”<sup>④</sup>。上海郊县一带，“素崇俭朴，虽士大夫家，居只布素，有事暂服绸绉。今差役之流，居然天然缎套，其妇女亦天青缎，披红绉裙，满头金珠矣。”<sup>⑤</sup>那些商贾人家，更是“居以华夏，使以仆婢，非腥膻不下咽，非绸绉不著体”<sup>⑥</sup>，以他们的财富炫耀于人而令世人羡慕不已，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使得“崇本抑末”的传统国策日益式微，“重农轻商”的社会心理逐渐淡化，“贵义贱利”的价值观念急剧转变，形成了“尚利民风薄，多金商贾尊”<sup>⑦</sup>的崭新价值观。这种“尊商贾，贱文士，奢侈喜夸，争逐货利”<sup>⑧</sup>的近代江南民风，正是构成资本主义基本价值观念的商品自由竞争意识，它在主观上或许是为了追逐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在客观上则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这种“重商”观念和竞争意识同传统的思想文化有着质的不相容性，这在一个向来以循规蹈矩、“知足常乐”为信条的国度里，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对人们心理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近代江南社会的这种奢华风气，与封建时代的奢风靡习不可同日而语，

① 《我为女同胞叫屈》，《新盛泽》民国十五年三月十一日。

② 《足》，《新盛泽》民国十四年九月一日。

③ 《生计问题》，《新盛泽》民国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④ 储学洙，南汇县《二区旧五团乡志》卷13，风俗。

⑤ 金福曾等，光绪《南汇县志》卷20，风俗志，风俗。

⑥ 程其珪等，《嘉定县志》卷8，风土志，风俗。

⑦ 同治《苏州府志》卷31，第14页。

⑧ 沈云《盛湖竹枝词》卷上，叙一。

它是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人生观。人们对封建等级观念和礼制形式不屑一顾，开始积极主张和勇敢实践人人人生而平等的权利，重新认识和确定人的价值，这正反映了传统控制的弱化和江南社会的进步。

随着近代丝绸业的发展，连一向滞后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民风习俗也在悄悄地嬗变。在传统的江南社会里，“乡愚无知，迷信神权，喜好淫祀”<sup>①</sup>的情况十分严重。佛祖、神仙自为人们所虔诚信奉，各行各业的守护神也为人们所顶礼膜拜，丝绸行业崇信的神道仙长多达数十位。以上神道，各有祭节，遇有祖师诞辰、神道生日，便要迎神赛会，祭祀祈福，“每次所费钱多的十余万，少的亦一千几百元”<sup>②</sup>，空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近代以后，这种宗教性节日民俗的迷信色彩日渐淡薄，在旧形式中增添进新的内容。行业的神祠社庙中多有“陈列名花异卉，歌唱各种名曲，对唱山歌”<sup>③</sup>的。传统的迎神赛会也渐为勃兴的近代商品赛会所取代，“取法美国之华盛顿纪念会，南洋、菲律宾之嘉年华会，展示新奇，暗寓讽劝”<sup>④</sup>。逢有神道节令，同业聚会一处，演出京昆杂剧文明戏，陈列采桑、育蚕、缫丝、织绸的生产场景和技术知识，展览各种别具一格的丝绸品种和新型花样，“审查性质，分别等第，给以奖章，以示鼓励”<sup>⑤</sup>，沟通了蚕农、机户、绸商和厂主的信息交流，使之“各在竞争上求其出品之精进”<sup>⑥</sup>。长期来习于乡居独处、集市庙会的丝绸业者，如今陡然置身于“绝后空前之会所，四通八达之市场”中间，难免“目眩舌舛而忘其所以”，于“荡心骇目，巍然焕然”中而大开眼界。更重要的是，“此非徒

① 仲廷机：《盛湖志》卷3。

② 江苏省政府编：《江苏旬刊》第1期，民国十七年。

③ 《中元节赛会纪事》，《新盛泽》民国十二年九月一日。

④ 《赛会小言》，《新盛泽》民国十二年九月一日。

⑤ 苏州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802；案卷号：105。

⑥ 《民国经世文编》第4590页。

为游目骋怀已也，必合全业之心思学问，相与研究；若者为日用之需要，若者为社会之消费，若者宜加改良，若者宜事扩充，若者为可抵制以塞漏卮，若者为可外销以收利益，则自今以后，农工商业联为一气，社会程度进于无形”<sup>①</sup>。

以上，笔者选择了固有经济结构的改组，新兴社会群体的崛起，传统社会生活的演变这几个透视点，考察了随着近代丝绸生产的发展江南社会所发生的种种若隐若显的变化。尽管它无法涵盖近代江南社会变迁的所有方面，其本身有些也仿佛是刚刚显现在东方天空的一抹曙色，但它无疑标明了近代江南社会进步的方向和轨迹。在某种意义上，江南社会的种种变迁也正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责任编辑：侯宜杰）

（作者王翔，1956年生，苏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

<sup>①</sup> 《近代博览会事业与中国》，《东方杂志》第26卷，10号。